

2004.4 (总第一百零四辑)



要

- 山西票号纪略
- 我所知道的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
- 龚望先生的教学之道

目

- 我的治学经历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总第 104 辑. 2004 年第 4 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ISBN 7-201-03717-X

I. 天... II. 中... III. 文史资料-天津市 IV. K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3316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23332446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宏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字数:140 千字 印数:1-3000

定价:7.00 元

目 录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2004·4(总第104辑)

金融史话

- 经营有方的余大亨银号 邢伯涵(1)
- 稳健经营的颐和银号 刘嘉琛(10)
- 山西票号纪略 许敬敷 王子光(20)
- 雍鼎臣与隆泰证券行 洪 升(26)
- 我所知道的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 刘续亨(33)
- 天津外汇市场见闻 林凤钧(40)
- 外商在津经营保险业内幕 许良灏 戴学熹(54)

工商史话

- 解放后天津港的振兴与发展 陈 健(65)
- 天津香油坊行业 刘金榜 穆子阶(76)
- 天津茶行业 慕 羽(82)
- 天津城里的三种独特手工艺 姚惜云(93)
- 干鲜果业发展纪略 刘完璋(101)

教育春秋

- 龚望先生的教学之道 李凤池(110)
记教育家曹鸿年 曹世瑛 曹世雄(120)
王劭廉——北洋大学第一任中国总教习 王鸿绪(131)

医药史话

- 隆顺榕药庄 刘华圃(138)
天津中药业发展史略 刘华圃 高克成(148)

政协之星

- 我的治学经历 南炳文(159)

文化之窗

- 近代天津的期刊概览 杨大辛(175)
董坚:高级建筑师、粤胡演奏家 林 放(185)

· 补 白 ·

- 南开女中琐忆 胡经文(52)

- 封面照片说明 (9)

经营有方的余大亨银号

△ 邢伯涵 △

余大亨银号在天津市是个比较老的银钱业字号,从开业至结业可分三个阶段:余大——余大昌——余大亨。这个字号 40 年来虽然经历不少风险,但一直保持稳健发展,且始终获利甚丰。兹将三个阶段的历史过程以及经营管理各方面,分述于后。

一、从余大到余大昌、余大亨

1. 通力合作创余大

余大创始于 1912 年,坐落在天津老城北门东。经理王晓岩、门杰臣,经营银炉生意,收购各路外客的各色白银,如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东北、湖南、湖北各地的元宝、银锭、十足(十两重的小元宝)等各色银两。收购后熔铸成为九九二成色的东海关 50 两一锭的元宝。在收购过程中,经检验有含金者则先把金提出后再铸成元宝。其程序是:外客交来的各色白银,当面逐个用钢锉在银子边角处锉一亮面,再于锉痕上抹上少量硫酸,瞬间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灰黑色,视其颜色深浅即能估计出哪些含金,哪些不含金,以及含金量多少。对含金者,按其含量多少给予不同程度的升色,即是在原分量外加上升色分量。对不含金者和含银量低者则予以耗色。这种估计技术王晓岩有独到之处,所以在门市上的收购工

作由他亲自鉴定。后院设有银炉 5 座,由门杰臣在头炉上亲自熔铸。提金地点设在三条石以北小闸口人烟稀少之处。因提金时需用硫酸和硝等,熔解时气味呛人,所以操作总是在夜间进行。提炼后金子粉末沉在底下,而银子则呈灰色絮状银粉。提出的金粉积有成数就利用银炉铸成 10 两一条的金条,而银粉仍铸成 50 两一锭的元宝。因为这种银粉是纯质的,在铸元宝时还得适量加些铜片,使成色在九九二的标准基础上,高升低补,由钱业公会设立的公估局予以鉴定。

彼时做炉房生意的银号天津市只有三家,除余大外,在估衣街有义胜银号,官南有益兴珍银号。北门里的金店也有做此项生意者,但均不如余大做得广泛、灵活,大部分外客奔向余大,因而生意极为兴旺。

余大开业时资金不多,且是小股拼凑的。以王晓岩具名的股本内含有麦加利银行买办邓仰周、鲍荫卿以及商会职员王荫龄的股款。至余大亨后期,遵照国民政府所颁布的银行法改为钱庄增加股本时,都正式公开具名,并担任董事及董事长等职务。余大由于王、门二人通力合作,艰苦经营,颇有利润,因而声誉日隆,引进大股东的投资,扩大了经营范围。

2. 扩大经营余大昌

王晓岩善于联络,与官商交游甚广。约在 1918 年有恒记德军衣庄的章瑞庭、山东省东芦盐运使王鸿禄和交通银行副经理张朗轩加入资本各 5 万元,连同王晓岩、门杰臣资本各 2.5 万元共扩充 20 万元。并增聘王捷三为经理,将字号增一“昌”字,改为余大昌银号。除仍继续银炉生意外,同时经营存放款(俗称“放架子”),业务日渐发达。

新股东章瑞庭和张作霖是朋友,张作霖来津就住在章瑞庭家。恒记德军衣庄专做东北军的生意。1922 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张作霖失势,章瑞庭因之受到波及。同时因政局动荡,山东省东芦盐运

使王鸿禄也感失意。同年章、王二人相继退股，新聘的经理王捷三也被迫辞职。幸蒙交通银行副经理张朗轩大力维持，介绍交通银行经理林熙生补入资本 5 万元，又有张朗轩的二弟、铁路局提调张芷庵和五弟、中法银行买办张晋卿补入 5 万元，资本总额仍为 20 万元。林熙生为总董，张芷庵为协董，张朗轩为监察，并聘请张晋卿为副经理，王晓岩、门杰臣仍为经理。

红利分配计财股 6 股、人力股 4 股，每年年终结账，股东分得的红利必须在号中存储二年，月息 6 厘，每年取息一次。另付股本官利周息 4 厘，每年年终发给。从财股中还提出股利平均准备金 6 厘，存储号中，不计利息。这项准备金全系股东所有，与人力股无涉。

人力股的分配：总董、监察各 4 厘，协董 3 厘，经理二人各一股，副经理 6 厘，另有公积金 3 厘永存号中不计利息，有人事变动时，方得分配。

自余大扩充资本改为余大昌以后，王晓岩即不在门市上收购白银，门杰臣也不亲自在银炉操作，都由提拔的职工办理。王、门二人掌握号中全盘业务，并先后在北京、上海设立分号和分庄。上海分庄一人，住南京路天华行内办理申汇收交事宜。北京分号设在前门外施家胡同，经营存放款生意。深县人孙斌卿被聘为北京余大昌银号经理。走街人员如郭铭三、谢韵甫等也是深县或冀县人。由于他们业务熟悉，具有一定号召能力，在正常时期放款总额能达到 50 万元之数，几乎占天津总号放款总额的四分之一。

在做申汇的年代里，因为是申汇，余大昌自己编有自用密电本，如“收交通银行一万两”，自编号为 0010 之类等，到电报局发电报时，把密电本交给电报局接密码检查后，才准予拍发，且电报费要比普通明码电报费高三倍。这种自编的密码很不健全，遇到密电码未编入的字号就得拍明码。因有此漏洞，便让有的人钻了空子。一次，在天津有人拍往上海申庄一封明码电报，电文是：

“交春源永五千两”，同时上海有人去收款，且要求取现。结果驻申人员核与手续相符，就照数付给了。及至天津总号接到复函后查无此事，复电查究，但该款早已被取走，字号也没有了，始知受骗。后经多方查找，知系曾在驻申处当过工司的人所为。真相大白以后，总号文书及驻申人员嫌疑才解除。经过这次教训，才改换了密电编制。

军阀混战时期，余大昌把铸成的元宝交天津造币厂铸造银元，一则行情合适，二则交银以后银元未收回以前可得优厚利息。北伐成功以后，国民党接收造币厂后，对这笔债款，拒不承认，以致余大昌亏空约三万元。1934年夏，国民党财政部长孔祥熙去北平时，预先告知将在天津东会天津绅商。天津市商会及银行业、钱业均有代表参加，王晓岩也在被召见之列，他乘此机会连夜赶写节略向孔祥熙面陈天津造币厂欠款情况，理由是天津造币厂既由“中央”接收，该项债款理应由“中央”负责偿付。孔祥熙接到节略以后，面允办理，但发下的批文是：“已交内外债整理委员会查核办理矣。”从此石沉海底，杳无音信。

1928年祁仍奚经营的协和贸易公司倒闭，余大昌间接受到波及。余大昌与协和本无交易，但当时中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金融命脉掌握在外国银行手中，由于各外国银行买办华账房与协和多有往来，而各银号同业划账以各外国银行华账房为中心，各银号都在各外国银行华账房有存款，余大昌当然也不例外。彼时与协和有交往的外国银行华账房为远东、德华、华义以及中华懋业等银行同时倒闭，余大昌遭到倒账达七万余元，虽然经过多方努力索回三万余元，但至年终仍有呆账三万五千元，最终不了了之。

1929年股东兼经理门杰臣开设的蚨生祥银号（由其七弟门弼臣任经理）和其接办的同丰太斗店（由其八弟门戟临任经理）收存军阀王承斌大量存款后，购置了西开教堂后世昌里房地产，一时房

地产价格猛跌。正在这个困难时候,王承斌又要求提取存款,以致蚨生祥和同丰太同时难以周转,业不抵债。王晓岩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一夜之间迫使门杰臣退股并辞去经理职务,扣除蚨生祥、同丰太在余大昌的欠款,翌日登报声明,不久蚨生祥、同丰太宣告歇业。余大昌丝毫未受损失。门杰臣退出后的股本缺额,由王晓岩的亲家姚樾甫补充。

在军阀混战时期,余大昌由北门东原址迁到法租界(今滨江道)杨荫路营业。几年内发生上述事端,同时还有一管庶务的职员暴病死于号中。种种不祥,王晓岩认为与风水有关,请来堪舆者察看,认为是电车道上电线杆的影响。彼时蓝牌电车在滨江道上行驶,有一支电杆正对着余大昌,形同钓鱼杆,因“余”与“鱼”同音故而不利,因此于1931年迁回北门东原址。

3. 走向衰落的余大亨

1933年余大昌实行了大改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总董林熙生早已不担任交通银行职务,在上海成立大陆盐号,因经营不振,欠有余大昌巨款,并且在很早以前由林经营的东来成五金行和北方木行尚有积欠,总计起来,欠款已经超过其在号的股本和红利。因此王晓岩劝其退股归还职欠,林只得照办。股东张芷庵已去世,其五弟副经理张晋卿也因个人经营不利申请退股和辞去副经理职务。股东姚樾甫因个人经营的义聚永酒店亏赔相继退股。后来前大成银行经理王稚亭联系阎相、郑瑞生、郑兰亭等入股,结果未能凑足20万元之数,只好将资本改为15万元。聘请王稚亭为经理,营业主任陈锡三升为副经理,改字号为余大亨。

改组后余大亨在北门东原址营业不多日,因日军收买吸毒流氓成立便衣队阴谋制造事端,余大亨为了安全起见又迁到法租界(今哈尔滨道恒和西里)。继而裕津银行在法租界(今吉林路)建筑楼房,余大亨投资二万元,议定“房无租价,钱无利息”,落成后即迁入新居,也就是最后号址。

约在 1935 年间王晓岩与沈雨香、王荷舫、王泽溥、胡汉卿等成立振益银号，升余大亨副经理、陈锡三任振益经理，升会计主任王治安为副经理；并让从交通银行辞掉职员职务的王晓岩之子王秉钧任余大亨副经理，后来又升营业主任蒋文辅为副经理。此时王晓岩已升为总经理。

七七事变以后，天津市沦陷，王晓岩被敌伪任命为天津市治安维持会委员和金融对策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及至伪天津市政府成立，首任伪市长高凌霨又聘他为伪市府参赞。他为摆脱伪职，时常装病并从此大反常态，情况愈恶劣，日军找的愈紧，他的脾气愈乖张。号中人员与他日渐离心离德，最后发展到众叛亲离，得力人员相继去职。如副经理王治安、蒋文辅辞职成立公兴永银号，走街人员靳煦午辞职成立华成永银号，北京经理孙斌卿带走五位职员成立义和银号，后来经理王稚亭也辞职另创新事业。至此余大亨已是气息奄奄。

抗日战争胜利后按国民党政府颁布的银行法增加资本，改银号为钱庄，又有新股东加入股本。如兴隆洋行的高少洲，大陆银行的齐少芹、刘晓言，以及凌月波、张志斋等，并聘请刘幼安（学裕）为总经理，吕志青、苏雨斋等先后任经理、副经理。虽然一时颇有生气，但由于元气已伤，颓势难挽。北京余大亨于 1949 年开始清理，1951 年天津总号也继而结束。所幸并无亏累，也无倒账。

二、经营和管理

从余大昌时期开始做存放款以来，对于放款对象都要进行详细调查并形成传统，由经理、副经理主持召集营业主任、交际主任（即走街头头）、会计主任及走街人员共同开会研究，设有议决录。如某字号的股东财产情况、经理人的品行、经营管理能力以及营业盈亏收成多少等等均记载在决议录上，最后决定的放款数字也明

确详载决议录以资备查。

放款对象以绸布纱业为最多,次为油粮行、五金、杂货、木行、洋行、盐务以及各大工厂等。其放款总额,在正常时期总在 150 万元到 200 万元之间。总之放款对象以有根有底的大字号为主,俗称“大八件”户,对于边边沿沿的小字号很少交往。

存款来源多系军政界人士,如齐耀琳、齐耀珊的家属及其经租处,东北系李东馥、西北系丁鹏九等;定期存款多系堂名或伪人名,如丁鹏九存款用伪名金素庄名义等等。这类存款在正常时期一般在四五十万元之数。

利率情况:定期存款一般是月息六厘,而放款则为月息一分,至少九厘。对各商号的往来存款多不计息。以上都是正常时期的情况。至于在敌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景况大不相同,由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利率多为日拆,高达 16 元到 28 元。收存款利率高,放款利率也自然水涨船高。

至于银炉生意在 1933 年底“两”改“元”以后停止经营。把收购现银业务移交给中国国货银行办理,并将熟悉银两能手苑盖仲也调归该行工作。因为申汇已无生意可做,申庄也于同年撤回。

在余大昌扩大资本时,交通银行副经理张朗轩是大力协助之人,且是股东的最长久者。张死后由其子张勋臣继承,张勋臣死后由第三代张士杰继承,直至余大亨结束。

交通银行与余大亨的关系最深,平时一般在余大亨存款 10 万元左右。遇到意外风波,余大亨除依靠交通银行外,得到中国银行的帮助也很大。如在协和贸易公司倒闭时,余大昌遭到间接倒账,为了渡过难关,曾向中国银行抵押借款 20 万元,在中国银行经理卞白眉大力支持下,得保无虞。

另外余大昌时期还代发行中、交两行暗记券各 10 万元,交纳现金准备四成,保证准备六成。而且四成现金准备还付给利息,因之余大昌获利不少。彼时凡中、交两行钞票印有“余鸣”二字者,

即为余大昌代发行的暗记券。

1938 年为了保本起见，曾设有货物部，首批购进麻袋 20 万条，又陆续屯积些油粮、面粉等商品，以防货币贬值，后因敌伪当局查得太严而取消了。

余大亨放款从来谨慎，除对新客户预先作好调查研究外，平日与来往客户做业务特别注意，不出疏虞，以避免发生意外。如在余大昌时期与对面一家字号为荣庆恒的颜料庄交往颇为密切，对其放款数额很大，甚至可以突破一些原则限制，给予特殊临时放款。一段时期该号一改常态，多方拉拢各银号走街人员。最初是留吃饭，在吃饭时添些好菜；继而留打牌，赢者拿走，输者记账，以至发展到整夜赌博。王晓岩查觉后，即主张与该号逐步疏远，放款由多到少，由少到无。果然不久该号亏款倒闭，欠各银号债款颇巨，而余大昌却毫无损失。这件事多少体现了余大昌做生意的独到之处和王晓岩机警过人、果敢决断的特点。余大亨的这种谨慎也是经过协和贸易公司倒闭间接受到损失，以及与造币厂交往受害而得来的深刻教训。虽然在特殊环境下为福星面粉公司、敦庆隆绸布庄、福元织布工厂以及合泰盐店一时遭到意外损失，周转不灵，但经过维持都能转危为安，对他们的放款都全部收回，未受任何损失。

余大亨对职工的管理和待遇，可以说是严而吝。如号址在北门东时，隔壁是华贞女子商店，经营日用百货。余大亨严禁职工到华贞商店去买东西，违者有被解雇的危险。晚上工作完了以后，不准职工外出闲逛，聘请一位“老夫子”吴少洲给职工们讲《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籍，大小同事都须一律听课，无特殊事不得请假。

职工的待遇也是苛刻的。头一年学生意的职工无工资，年终馈赠 10 元至 15 元。一般第三年才能起薪，但资方认为成绩好的第二年可给起薪五角，按一薪一酬发给，即每月发一元，以后每年

递增五角。但特别能干的也有增一元至二元者,不过是极少数。无论是来学生意的还是同事进号,一律须找保,由保人立具保单,倘有意外损失,由保人负完全责任。

总之余大亨年年获利在 10 万元左右,但对职工并不优厚。至于业务经营是稳打稳进的,40 年来可以说是比较稳健和顺利的。

(作者系余大亨银号职员,曾在王晓岩主持钱业公会时任秘书。该回忆文章写于 1979 年 11 月)



天津是中国金融业的发祥地。票号、钱庄作为早期的金融机构,对天津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及对外贸易的日益兴旺,天津相继出现了数十家官办、私办银行和外商银行,形成了钱庄、外商银行和本国银行鼎足并存的局面,促进了天津经济的发展和北方经济的繁荣。图为清末年间的水源钱局。

稳健经营的颐和银号

▲ 刘嘉琛 ▲

颐和银号创办于1929年3月，由旧军阀王占元独资经营，资本定为10万元，外加护本10万元，聘请天津金融界知名人士倪松生任经理，雇用职工40人，经营存款、放款、汇款业务。地址设在旧法租界26号路（今和平区滨江道上一胡同内）。

北伐战争前王占元任湖北督军时创办了乾丰厚银号。在当时军阀割据各占一方的年代里，乾丰厚银号在湖北地区相当于天津地方官银号，经营存放汇业务，办理地方财政收支和军费开支。乾丰厚银号经常是车马盈门，宾客如云，繁荣景象可称是盛极一时。但是好景不长，1928年北伐战争炮火打响，各地方军阀均被打倒，乾丰厚银号随着王占元的倒台而完结了。

王占元倒台后放弃了政治生活隐居在天津旧英租界做寓公。为了增加财富，他用所掠夺的湖北人民血汗钱购置了动产和不动产并开始做起生意，随之颐和银号产生了。

颐和银号1929年3月开业，至1949年5月结束。20年的经营历史大致可分为兴盛、衰退、复苏三个阶段。

兴盛阶段

1929年至1937年是颐和银号的繁荣兴盛阶段，存款和放款总额达到历史高峰。当时天津市银号存款、放款总额在100万元

以内的居多数,在 100 万元以上的居少数,而颐和银号存款、放款总额竟达 200 万元之多,在同行业中名列前茅。

颐和银号属于天津西街银号,专营存放款和汇款业务,经营特点是少而精。倪松生的指导思想是求稳,能失衣不乱步。因此在经营方法上是比较慎重的。比如在选择工商业往来户上,无论是该行业中的大户,或殷实的中小户,要求业务人员事前做好调查,对股东姓名财产、经理人信用、经营业务现状,以及与哪些银号有往来关系,摸清底细,提出初步放款额度,经倪松生同意后,开始建立往来关系。业务人员每天汇报市场活动情况及放款大户动态,然后通过与企业往来考察企业资金动向,不断进行分析研究,做到心中有数。

颐和银号存款来源主要有三方面:(1)堂名存款,就是定期存款,期限是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不等,存款利率在六厘左右。(2)往来存款,就是活期存款,利率最高三厘,一般户不计利息。(3)银行往来存款,利率二厘至三厘。放款对象主要是商业、工业大户,如卞润吾开办的隆顺棉纱庄,范竹斋开办的余丰厚棉纱庄,卞家开办的隆昌海货店及正兴德茶庄、福星面粉公司、寿丰面粉公司等。对他们放款利率是最低的,只有六厘至八厘,而且放款额度较大,有时一户就贷给二三十万元。当时放款利率差距很大,最高一分五厘,最低六厘。大型户是六厘至八厘,中型户是九厘至一分一厘,小型户是一分二厘至一分五厘。颐和银号选择低档利率贷款户的目的,一是放款安全可靠;二是套取大户存款;三是显示经营风度。但是和同类型银号相比,盈利相对就少了。祥生银号每年盈利不低于 10 万元,而颐和银号却是 6 万至 10 万元。这个差距是和倪松生求稳怕乱思想分不开的。

颐和银号的业务发展在同行业中名列前茅是有原因的,主要有三方面:

1. 王占元财大势大,在社会上有号召能力。银行、银号是信用

部门,财势大、资金雄厚对吸引存款是非常有利的。王占元的银号又是独资经营,比那些七股八份拼凑的银号条件好多了。

2. 倪松生资格老、信誉好。倪松生长期担任天津市钱业公会常务董事,由于他处理事务稳健细致,受到历任会长王晓岩、范雅林、焦世卿等人的尊重,公会较大事情都愿意和他商量。他在金融界结识一些知名人士,如北洋保商银行经理郑少棠、大生银行董事长张鸿卿、东莱银行经理薛赞庭、朝鲜银行经理赵士林等人。当时金融界十余位老人经常在一起聚会娱乐,交流经验,互通情况。在这些社会交往中倪逐渐成为金融界一位资格老、信誉好的知名人物。

3. 业务人员配备得力。如李焕章,在同行业务人员中可称是第一流的好手,为人正派,善于联系,有一套语言艺术。他对各行业中的大户,都能建立较好的往来关系,同行业的业务员、工商业的财会负责人都愿意接近他。在业务发展上,他称得上是倪松生的得力助手。

衰退阶段

从1937年至1945年是颐和银号衰退阶段。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平津两市陷于日伪统治之下,天津金融业的大小业主们反应不一,有的南调资金,有的随军后退,有的缩小范围,有的观望等待,有的则乘机发展。颐和银号、庆益银号、大昌银号属于稳健派,采取了观望和缩小范围的做法。广利银号、广余银号、泰和银号属于激进派,乘机大力发展业务,在同行业中被称为“时髦”银号。

凡事不进则退,银号业务也是一样,眼看着颐和银号业务日趋下降,倪松生力图挽回不利局面,于是采取提升丁杰青、陈子瑞为副经理的办法,欲使业务振兴,但这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因此,